

学人

真善美是诗的三个金色的轮子

——访诗歌评论家吴开晋教授

本报记者 高 昌

9月16日,记者在北京采访了著名诗歌评论家、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吴开晋先生。先生大病初愈,但是精神很好。他告诉记者:为迎接山东大学建校110周年,他目前接受学校任务,正在赶写一篇纪念高兰教授的文章。先生自豪地说:“山东大学有着优秀的人文传统,上世纪30年代杨振声、闻一多、舒舍予、梁实秋、沈从文、游国恩等云集山大,形成山大的第一个黄金时代。50年代王统照、吕荧、殷孟伦、殷焕先等还有著名的‘冯陆高萧’五位名教授又在山大任教,形成山大第二个黄金时代。”

“冯陆高萧”是四个姓氏,为什么却是五位教授呢?

吴先生笑了:“‘冯’是指冯沅君,‘陆’指陆侃如,‘萧’指萧涤非,‘高’却是指高亨和高兰两位教授,所以‘冯陆高萧’是指五位教授。”冯’陆’和高亨教授的道德学问,已经融进了山大的人文传统。冯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妹妹,陆先生是她的丈夫。他们去世后,冯先生将遗产捐给山大,设立冯陆奖学金,泽被了众多学子。萧涤非先生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学人。这五位教授中,我和高兰教授是最熟悉的。我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们不仅在同一教研室工作,还曾共同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现代诗歌硕士点,一起招研究生。他讲授现代诗歌,我讲授当代诗歌。高兰教授是著名诗人,他的《哭亡女苏菲》至今传诵。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外语好,能看原文。而且他的古典文学功底深厚,李璟、李煜、苏轼、李清照的诗词更是倒背如流。他学问深,名气大,却还保留着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为人很直,很纯。比如先生喜爱水仙花。为了观察和等待水仙的盛开,他可以一直在水仙旁边坐一夜。有一年我带学生去敦煌采风,他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同行,嘱咐我一定给他带一件敦煌的东西。我后来从阳关给他带来一块紫色的石头,他喜欢得不得了,特意把这块石头做了镇纸,说看到石头就能想起那个遥远的地方。他脸上那种纯真的笑容,非常令人难忘。”

吴开晋先生说:“高兰先生有诗人的浪漫,可是做学问却一丝不苟,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学术态度非常严谨。这和今天某些年轻学人看一点书,网上搜集一点点资料,就匆匆落笔成文的治学态度是有着天壤之别的。高兰先生那一代老先生在治学的严谨方面,是一致的。他们既有自己的学术创见,绝不人云亦云,同时又有严格的论证和考证,绝不信口开河。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我是1978年来到山东大学任教的,恰逢山大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当时一起教授现代文学、美学还有其他学科的教



学失衡现象,的确令人深思。”

我问:“四卷本的《吴开晋文集》最近出齐,在读者中尤其是诗歌界反响非常好。这些科研成果,很多是您在紧张的教学之余完成的。作为一线教师,怎样搞好学术与科研的关系呢?”

吴先生说:“这两者的关系其实是互补的。作为教师,当然首先要搞好教学,不然就会误人子弟。而如果自己搞一些科研,写一些文章,再把研究成果更好地应用到教学中去,不仅可以提高学术水平,增加新鲜血液,开阔视野,丰富教学内容,还可以促进与学生沟通,实际上这对教学工作是一种促进和升华。其实不仅教学与科研之间有这种辩证关系,就是评论和创作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和完善理论。没有写作经验,我们很难进入诗歌的深处和细微处,很难提出自己深刻而独到的发现和见解。托尔斯泰有艺术论,艾青有诗论,朱自清、戴望舒等很多作家、诗人都同时又有自己的理论著述。”

记者问:“记得您的第一本诗论著作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现代诗歌名篇选读》。当时国内出版过几本综合性新诗选本,但是附有评论的却不多见。这本书的出

版至今已经近30年了。如果现在让您重新来编选,请问编选标准会有什么变化?”

吴先生说:“现在来看,当时的思想不大解放,考虑最多的还是思想意义,对艺术特色有所忽略。李金发诗歌根本没选,徐志摩、戴望舒的作品其实也还可多选一些。当时著名的《九叶集》、《白色花》还没有出版,所以对九叶派、七月派的作品也有所忽略。今天如果重新编选,标准当然会有变化。不能只注意教育功能,也要注意审美功能。注意诗与时代、与生活的关系。”

他说:“诗人们多元化的思维已代替了过去单一的思维,也必然导致诗歌多元的态势向前发展。这种多元的态势不仅会影响诗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和风格流派以及题材、体裁的多元化,而且在诗的功能上也会是多元化、多方位的。正是这种多元化思维和

全方位的艺术创造方式,构成了新时期诗坛现代化诗歌的多元形态和基本定势。我尤为推崇和看重那种‘聚合’式的诗歌,也即在多方位地吸纳了不同艺术质素的基础上而创造的诗歌形态。聚合、交融正是裂变的基础和前提,而裂变则是聚合的必然结果。诗歌就像一棵大树,根基是传统文化,再吸收东西南北方的雨露,拥抱自己的太阳,才能茁壮成长。艾青先生就说过‘真善美是诗的三个金色的轮子’(大意),核心是真,没有真就谈不上善和美。好的诗歌不能说假话,要给人道德的启示,给人美感,要给人一种向上的健康的力量。艺术风格上可以有古典味道,也可以有现代的味道,但要有自己的东西,表现手法要丰富。”

谈到当代诗坛,吴先生表示自己有几个忧虑:“一、某些青年诗人没有经过过去的苦难,现在却带着极左情绪来盲目歌颂‘文

学’时期的生活。他们不能真正忧国忧民,而是胡乱咒骂。头脑不清醒,容易被人利用。当前的一些社会矛盾并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恰恰是改革需要面对和解决的。二、还有些年轻人抛弃诗歌真善美,在诗里表现感官刺激,迷恋写下半身,而不是写心灵的真实旋律。他们不甘寂寞,哗众取宠,搞低俗、庸俗、媚俗那一套。三、诗歌语言缺少锤炼推敲,把口语诗写成了口水诗。实际上,‘你吃饭没有,我吃的是馒头’这样的口语不是诗,诗当然可以写生活片断,卞之琳先生的《雨》一首新诗名作的题目就叫《断章》,但这种片断在艺术上是完整的,是经过提炼和艺术加工的,有立体感、形象感,有内在的语言张力,所以才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四、轻视传统。有个著名诗人曾经跟我谈新诗没有传统。这个论点我不赞成。传统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稳定性,还有一个是传承性。新诗发展至今已经90年了,怎么能说没有传统呢?五、缺乏精品。以长诗为例,过去人们写长诗多,评论界还发出过呼唤长诗的声音,但现在长诗发表的很多,不过却量多质次,太好的不多。大量的长诗都是根据社会重大事件出现的跟风之作,堆砌事件,水分很大,像当年洛夫《石室之死亡》、北岛《白日梦》、杨炼《诺日朗》那样比较优秀的长诗,确实不多了。”

尽管对诗坛表达了诸多忧虑,不过,吴先生认为对诗歌的前途不要悲观。他说:“将来的诗坛必是五彩缤纷的春天。艾青生前曾经说过人类的语言不绝于耳,诗不绝于耳。诗人苏金伞也曾说过:‘21世纪,是个诗的世纪。我们应该看到诗的世纪正在伴随着我们。’”

首先,吴开晋先生是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也是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他从事现代诗歌研究多年,著有《现代诗歌艺术》、《当代新诗论》、《新诗的裂变与聚合》等学术专著和《月牙泉》、《倾听春天》、《游心集》等作品集。近年推出四大本《吴开晋文集》。他主持完成了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新时期诗潮论》。其科研成果多次获奖,诗作《土地的记忆》也曾获以色列诗歌和平奖。

首先,吴开晋先生是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也是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他从事现代诗歌研究多年,著有《现代诗歌艺术》、《当代新诗论》、《新诗的裂变与聚合》等学术专著和《月牙泉》、《倾听春天》、《游心集》等作品集。近年推出四大本《吴开晋文集》。他主持完成了国家教委“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新时期诗潮论》。其科研成果多次获奖,诗作《土地的记忆》也曾获以色列诗歌和平奖。

再现神话的“神话”

田 青

当《哈利·波特》席卷全球,原产中国的“木兰”和“功夫熊猫”被改贴上“美国生产”的商标行销世界的时候,国人或有不平:我堂堂中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从口头传说的无比丰富到《山海经》的瑰丽奇诡,从伏羲女娲、夸父精卫到浩如烟海、灿若星河的历史人物,哪个神话和故事不能编出一部好戏让世界惊叹呢?遗憾的是,就像在国际贸易中我们长期只能大量出口低附加值工农业产品一样,缺乏国际视野和品牌营销经验的“中国制造”文化产品,也长期不能打入世界主流文化市场。普通的民众可能并不知道,我们一些媒体在宣传某某人或某某文艺团体在国外“获得热烈赞誉”,演出“引起轰动”的报道中常常丢掉一句话:“此次演出系赠票,观众基本上是我们组织的。”而自己花钱租“金色大厅”,自己花钱包机组织记者团、观众团不远万里飞到外国,自己人演,自己人看,然后回国大肆宣传自己“走向世界”的闹剧,也曾蔚然成风。

实际上,在文化市场上“走向世界”的标准很简单,那就是让外国人自己掏腰包买票来看我们的戏。而我们所知道的真正能让外国人买票进剧场表演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团体,除了杂技团、木偶团以外,大概数“汉唐乐府”最为成功了。

“汉唐乐府”是来自海峡对岸的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团体,创办人陈

美娥是一个既娴熟中国传统乐舞舞粹又深知欧美主流文化品位的艺术家。她创造性地把中国闽南文化中保存的我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音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梨园戏中的科步(舞蹈)结合起来,开创了“梨园乐舞”这一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陈美娥和“汉唐乐府”陆续制作的《艳歌行》、《丽人行》、《梨园幽梦》、《荔镜奇缘》、《韩熙载夜宴图》、《洛神赋》、《教坊记》等作品,可以说部部成功,出出精彩,佳评如潮,不但成为国际重要艺术节和欧美诸多国家级剧院竞相邀演的对象,而且其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与《洛神赋》还于2007年和2008年应故宫博物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邀请进入故宫,在紫禁城皇极殿隆重献演。我曾经在荷兰和法国亲眼目睹“汉唐乐府”受到欧洲文化界、艺术界同仁和普通观众欢迎的盛况,也曾经专门了解了“汉唐乐府”在欧美的票房情况。要知道,在类似巴黎国立剧院这样久负盛名的世界顶级剧院连续公演12场而且场场售罄是很不容易的,对于一个来自“陌生文化国度”的艺术团体来说,这几乎就是一个“神话”。而在美国林肯中心演出之后被《纽约时报》评选为“全美舞蹈年度风云榜”最佳舞作,对一个以在全世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

的中国艺术团体来说,更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巨大成功。

挟连续创造欧美主流社会票房“神话”和专业评论佳绩之风的“汉唐乐府”,此在北京太庙首演的《武丁与妇好》,演绎了一段纯粹“中国风”的徜徉于史实与神话之间的凄美故事。陈美娥用婉约抒情的南音音乐和梨园科步配合《诗经》中千古不灭的诗句,把殷商时代的一个伟大传说呈现得美轮美奂。作为一个堂堂华文化的满腔深情;作为一个艺术家,陈美娥有着杰出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作为一个艺术团

体的创办人和组织者,陈美娥有着超出常人的巨大能量和不屈不挠的斗志。正是靠着这份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挚爱和激情,陈美娥才能将古老的中国艺术和世界的时尚品位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神话”。我曾经和她开玩笑地说:“你办的有没有不成功的,因为神鬼都怕你!”的确,创造神话的人一定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汉唐乐府”是,陈美娥也是。我和陈美娥的许多朋友一样,一直认为这个似乎永远年轻、永远美丽、永远风风火火的女人有着命运特殊的眷顾垂青,在天降大任的同时,她也一定得到了“天”的加持和护佑。

还有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内外缘结合”也颇为引人注目。当前,余英时先生提倡的“内在理路”说在大陆备受推崇。赵兴勤认为:“由‘外缘’研究到‘内缘’捕捉的转向,既是一个学术视角的转移,也是一场学术变革的兴起。但是,同夸大‘外缘’的影响作用一样,片面强调‘内缘’也未必是科学的。”“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抛弃历史的复杂性、研究对象的独立性而将‘外缘’简单黏附的做法,而要做的是,通过尽可能还原历史语境,打通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膜与障碍,用‘理解之同情’的目光,考量历史风尘中事物本身的真实印辙,交互变化以及动态发展,从而建构新的认识。”



《武丁与妇好》剧照 本报记者 卢旭摄

时评

科学是人类发明用来保障幸福生活的工具,人类是科学的主人而不是其奴隶!当人类能够客观公正地观察科学发展的时候,人类就成了科学的主人,才能真正完成以人为本的和諧社会的建构。

说到科学,人们都还记得不久前著名科学家霍金所做出的预言:人类最好是在200年内向外太空扩张,因为“面对地球有限资源和呈指数形式增长的人口数量,我们长期生存的唯一机会不是留在地球,而是向外太空寻找出路”,否则将难逃灭顶之灾。但是如果人类的科技不能阻止对于地球资源的糟蹋挥霍,又不能开拓出另外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时,人类逃不脱灭顶之灾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学会中国人所拥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和生命传递的孝道文化。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不断推动,人们越来越关注复兴的标和愿景。

至于孝道,孟子说过“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孝”字上边是个“老”,下边是个“子”。老人有责任和义务把文明和生命传递给子孙,子孙有义务和责任把爱心和荣耀孝敬给老人。老人要传递文明和生命,就得给子孙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不是无

休止地糟蹋自然资源和挥霍子孙的财富。子孙要孝敬爱心和荣耀,就不应违背祖宗的教训,去伤害生我养我的大自然,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同类,害人害己,而会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与人和谐了,人与自然和谐了,霍金所预测的灾难也自然不会不期而自免了!

西方的逻辑思维,试图用公式和定理去理解并且把握世界,然而世界并不是依照公式和定理建构的,尤其不是以西方人所发明的公式和定理构成的。也就是说,西方的思维概念和科学方式并不能够最终认识和把握宇宙和人生的真相,于是所谓的2012年“世界末日”以及霍金预测等,都将不可避免。

然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不仅不会把任何问题或者事物看成是死路一条,而是用变化的角度去把握变化着的宇宙和万物,与之同步,道法自然,便能够真正认识宇宙和人生的真相,从而使人类的行为合乎自然的规律。当我们不再破坏大自然的秩序,不再损人利己,而是努力建构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大自然也就不会抛弃我们,地球还会是我们美好的家园。

在赞叹民族复兴带来的富强和自尊自信时,更不能够忘记我们这个处在宇宙、天地、人类、万国之中的“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作者汲汲于复原世情小说的生成背景,为小说情节的惊人相似、人物举止的不断复制,找寻背后合乎生活真实、逻辑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深层依据,为我们展示一个周匝细密而又艰难审慎的研究过程。

赵兴勤教授撰著的《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文物出版社,2010年6月版)一书,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明清世情小说的形态,颇具创新意义。笔者研读之后,认为这是一部拓宽古代小说研究视野的佳作,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均给人启示。

首先,作者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坚定的学术立场

科学是人类发明用来保障幸福生活的工具,人类是科学的主人而不是其奴隶!当人类能够客观公正地观察科学发展的时候,人类就成了科学的主人,才能真正完成以人为本的和諧社会的建构。

说到科学,人们都还记得不久前著名科学家霍金所做出的预言:人类最好是在200年内向外太空扩张,因为“面对地球有限资源和呈指数形式增长的人口数量,我们长期生存的唯一机会不是留在地球,而是向外太空寻找出路”,否则将难逃灭顶之灾。但是如果人类的科技不能阻止对于地球资源的糟蹋挥霍,又不能开拓出另外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时,人类逃不脱灭顶之灾怎么办?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学会中国人所拥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维和生命传递的孝道文化。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不断推动,人们越来越关注复兴的标和愿景。

至于孝道,孟子说过“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孝”字上边是个“老”,下边是个“子”。老人有责任和义务把文明和生命传递给子孙,子孙有义务和责任把爱心和荣耀孝敬给老人。老人要传递文明和生命,就得给子孙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不是无

休止地糟蹋自然资源和挥霍子孙的财富。子孙要孝敬爱心和荣耀,就不应违背祖宗的教训,去伤害生我养我的大自然,也不会伤害自己的同类,害人害己,而会正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与人和谐了,人与自然和谐了,霍金所预测的灾难也自然不会不期而自免了!

西方的逻辑思维,试图用公式和定理去理解并且把握世界,然而世界并不是依照公式和定理建构的,尤其不是以西方人所发明的公式和定理构成的。也就是说,西方的思维概念和科学方式并不能够最终认识和把握宇宙和人生的真相,于是所谓的2012年“世界末日”以及霍金预测等,都将不可避免。

然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不仅不会把任何问题或者事物看成是死路一条,而是用变化的角度去把握变化着的宇宙和万物,与之同步,道法自然,便能够真正认识宇宙和人生的真相,从而使人类的行为合乎自然的规律。当我们不再破坏大自然的秩序,不再损人利己,而是努力建构和谐发展的和谐社会,大自然也就不会抛弃我们,地球还会是我们美好的家园。

在赞叹民族复兴带来的富强和自尊自信时,更不能够忘记我们这个处在宇宙、天地、人类、万国之中的“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作者汲汲于复原世情小说的生成背景,为小说情节的惊人相似、人物举止的不断复制,找寻背后合乎生活真实、逻辑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深层依据,为我们展示一个周匝细密而又艰难审慎的研究过程。

其次,作者追求有灵魂的学术

当学术研究变为牟利工具,生命感受、阅读快感和审美体验便统统被工具理性的操作者们抛诸脑后。人文研究者正面面临形形色色的窘境,创造力压抑于项目申报和评奖的层层枷锁,诗性屈从于学术规范的变动不居与庞杂繁琐,机械呆板、麻木冷漠、缺少烟火气和人情味的研究成果时有所见。在个别研究者那里,学术远离人间。这除了学术成果自身的小众特点以致“曲高和寡”外,还有就是脱离了人的在场感,使读者无法藉此获取历史的反思与生活的印迹。

拓宽古代小说研究视野

——评赵兴勤《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

肖 华

作者汲汲于复原世情小说的生成背景,为小说情节的惊人相似、人物举止的不断复制,找寻背后合乎生活真实、逻辑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深层依据,为我们展示一个周匝细密而又艰难审慎的研究过程。

赵兴勤教授撰著的《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文物出版社,2010年6月版)一书,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明清世情小说的形态,颇具创新意义。笔者研读之后,认为这是一部拓宽古代小说研究视野的佳作,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均给人启示。

首先,作者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坚定的学术立场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题上“避热趋冷”。目下,耐得住寂寞、埋首苦读者不是很多,真正立足文本研究,富于创新精神的成果相对较少。研究格局的失衡以及治学态度上的趋热避冷、逐易畏难,治学方法上的揆弃传统、追风逐潮,反映出学界选题角度的失重与价值取向的倾斜。赵兴勤教授既不向慕时尚的学术,也不追逐学术的时尚,毅然选择学科交叉的论题,将理学(研究之冷门)与世情小说(边缘之文学)熔铸一处,探讨二者之间“矛盾着的交织与纠缠”,表现出笃定的学术判断和坚毅的学术精神。

还有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内外缘结合”也颇为引人注目。当前,余英时先生提倡的“内在理路”说在大陆备受推崇。赵兴勤认为:“由‘外缘’研究到‘内缘’捕捉的转向,既是一个学术视角的转移,也是一场学术变革的兴起。但是,同夸大‘外缘’的影响作用一样,片面强调‘内缘’也未必是科学的。”“我们应该反对的,是抛弃历史的复杂性、研究对象的独立性而将‘外缘’简单黏附的做法,而要做的是,通过尽可能还原历史语境,打通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隔膜与障碍,用‘理解之同情’的目光,考量历史风尘中事物本身的真实印辙,交互变化以及动态发展,从而建构新的认识。”